

中国



皇帝皇后



全传

成思远/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南宋末三帝

成思远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成思远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0723-146-7

I. 中… II. 成… III. ①皇帝—列传—中国
②皇后—列传—中国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581 号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主 编: 成思远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600 千字

印 张: 518.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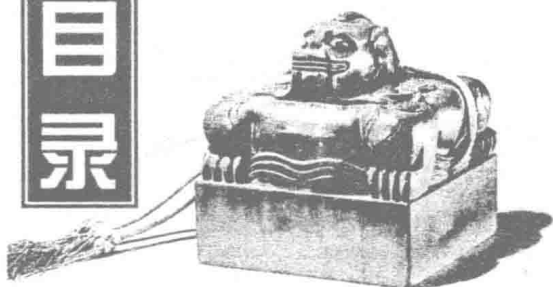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46-7/I·46

定 价: 2580.00 元(全 100 册)

目录



第一章	赵焘即位	(1)
第二章	大厦将倾	(4)
第三章	蒙古铁骑	(32)



第一章 赵昀即位

宋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癸未(8月12日),宋度宗死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宋皇宫中的福宁殿,时年35岁。

度宗原名孟启,生父是理宗同母弟嗣荣王与芮。嘉熙四年(1240年)四月初九(5月2日)生于绍兴府(在今浙江)嗣荣王的王邸。理宗没有儿子,宝祐元年(1253年)立孟启为皇子,赐名昀。景定元年(1260年),又立昀为皇太子,正式确定他为皇储。景定五年(1264年)十月丁卯(11月16日),理宗死,皇太子昀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按照惯例,新帝即位的当年仍沿用前帝的年号。次年改元咸淳。这个在当太子时就以好色著称的皇帝,当了不到十年的皇帝就驾崩了。死后二十五天,臣下上谥号为端文明武景孝皇帝,庙号度宗。

皇帝一死去,由谁继位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大事。

度宗有三个儿子。长子昱,咸淳五年(1269年)六月甲申(7月10日)生,母亲是杨淑妃。次子昀,咸淳七年(1271年)九月己丑(11月2日)生,母亲是全皇后。幼子昀,咸淳八年(1272年)正月辛未(2月12日)生,母亲是俞修容。

三个儿子分别由三个母亲所生,这在封建社会,特别是皇宫中是很平常的事。封建皇帝除了皇后之外,还有大批妃嫔,按照皇帝的宠幸程度,有不同的封号。在宋代,皇后之下为妃,妃又分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四等。妃之下为太仪、贵仪;以下是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以下是婕妤;再下是美人、才人、贵人。

度宗三个儿子的母亲,身份最高的显然是赵昀的母亲全皇



后,其次是赵昀的母亲,她是淑妃,赵昀的母亲只是修容而已,地位最低。

在研究应当由谁来继皇位的问题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当由昀继位,因为他是长子,当时有六岁。但这种意见被当时把持朝政大权的宰相贾似道以“立嫡不立长”的理由轻易地否定了。贾似道骨子里的打算是,皇帝越小越便于控制。

这样,就在度宗去世的当天,赵昀就在父亲的灵柩前即皇帝位,他当时只有四岁,如按实足年龄,还不到三岁。

君临天下,至高无上,封建皇帝是过去许多人羡慕而不敢梦想的地位。但赵昀的地位实在是不值得羡慕,因为宋朝此时已经处在风雨飘摇、面临崩溃的境地。

三岁只是托儿所的年龄,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料理,更何况要治理国家大事?可是,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位置一天也不能空着,即便是三岁的娃娃,如果没有别的人选,也要把他扶上皇帝的宝座。这显然是摆设,但却是不可缺少的摆设。不过国家政治生活还要运转,总要有人发号施令。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到了太皇太后谢道清的身上。

当时有“三宫”的说法,所谓三宫,是指太皇太后谢道清、皇太后全氏和皇帝赵昀。

在赵昀即帝位的同时,还向全国宣布,谢太后临朝称诏,即由她临朝听政,以她的名义颁发的命令也称诏书,具有与皇帝诏书同等的效力。是种种历史的机缘把这位 65 岁的老妇人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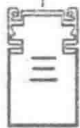
宋朝历代皇后、妃嫔,都没有在史册上留下她们名子,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比比皆是。唯有这位谢太后,在史籍上记载下她的名字叫道清,其原因,随着本书的叙述,读者将会清楚。

谢道清是天台(在今浙江)人,生长在高官显贵之家,她的祖父谢深甫在宁宗时曾任宰相,并在册立杨皇后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但谢道清的父亲很早就去世,家道中落。理宗即位,



准备选立皇后，杨皇后这时成了杨太后，想起当年谢深甫的功劳，命人从谢家的姑娘中选人入宫。这时谢家的姑娘只有道清一人尚未出嫁。她生下来就肤色黑中带黄，一只眼睛还布满白膜，她的兄弟准备把她送往宫中，一位叔伯不同意，说送她入宫要准备贵重的衣装，而她的模样只能在宫中当一辈子宫婢，有什么意思呢？正巧在元宵节时，有喜鹊在灯山上筑巢，大家以为这是后妃的吉兆，这位叔伯只好同意送她入宫。正在这时，道清得了麻疹，病好以后，脱了一层皮，肌肤变得洁白如玉，医生又用药去掉了她眼珠上的白膜，简直换了一副模样。和她一同选入宫中的还有制置使贾涉的女儿，长得非常漂亮。理宗的意思是要立贾氏为后，杨太后不同意，说“谢女端重有福，应立为后”。理宗只好服从，立谢道清为后，贾氏为贵妃。但理宗专宠贾妃，贾贵妃死后，阎贵妃又因美色得宠。而谢道清对此处之泰然。开庆元年（1259年），元兵一度渡过长江，理宗打算迁都平江（今江苏苏州）或庆元（今浙江宁波），谢道清进谏说，迁都会动摇民心，此事才作罢。度宗死，帝昀即位，她被尊为太皇太后，大臣请她垂帘听政，她以老病推辞再三，最后勉强答应了。

全太后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理宗的母亲的侄女，理宗为皇子祺纳妃，权臣丁大全推荐临安府知府顾嵒的女儿，已经致聘礼，因丁大全垮台，顾嵒也被罢官，大臣们提出，应另选皇子妃，并说全氏年幼时曾经跟随父亲全昭孙来往各地，备尝艰险，将来必能辅佐皇子。理宗因为母族的缘故，召全氏入宫，对她说：你父亲在宝祐年间（1253—1258年）死于国事，每想起来，令人可哀。全氏答道：妾父可念，淮、湖的老百姓更可念。理宗很欣赏她的见解，于是为皇子纳为妃。祺即位后，册封为皇后。全后的第一个儿子夭折了，后来又生了昀。帝昀即位，全氏被尊为太后。如果不是谢太皇太后健在，就会由她垂帘听政了。





第二章 大厦将倾

1224年(嘉定十七年),21岁的宋理宗在权相史弥远的操纵下登基即位,开始了长达40年的皇帝生涯。不能说这位年轻皇帝不思进取,即位之初,他也曾大刀阔斧地推行过一系列的整治措施,试图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有一番作为。无奈内外交困的局势,上下制约的现实,日趋窘迫的经济,使他在经过几番扑腾之后,不由得皱紧了眉头。

1234年(端平元年)“端平入洛”军事行动的失败,在宋理宗的心头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在此之前,与宋王朝争战一个多世纪的金王朝,在宋蒙联军的合击下灭亡了。金朝的灭亡使中国政局由宋、蒙、金三角鼎立演变成宋蒙南北对峙。宋理宗在了结了宋、金近百年的世仇后变得踌躇满志起来。既然联蒙灭金,“可以刷会稽之耻,复齐襄之仇”恢复中原,更是南宋高、孝、光、宁四朝梦寐以求的未竟事业,须知以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为中心的河南大地,乃是大宋王朝开国奠基之处,又是“宋朝陵寝所在”,丧失百年而能在此时得以“恢复”,这是何等的盖世奇功!宋理宗的急功近利立刻引发了部分朝廷大臣的狂热。在1234年的上半年,朝廷内外展开了一场“收复三京”的大论争。主战派头面人物,镇守淮南的赵范、赵葵兄弟向宋理宗提出了“守河、据关、收复三京”的建策。所谓守河,是指由宋军夺占黄河南岸一切地区,将蒙古势力赶到黄河以北,由宋军占据黄河险要,凭借黄河天堑阻止蒙



军南进；据关，即指夺取潼关天险，扼住要冲。这一建策的主旨在于收复以三京为中心的河南故地，凭借关、河险要地势，与蒙古势力分庭抗礼，保持新的南北对峙的局面。尽管有如此美妙的设想，但大多数臣僚都上书表示反对，认为收复中原的条件尚不成熟，一旦出师，后果不堪设想。

正在休假的大臣乔行简，听说朝廷要北战，急急上书宋理宗说：“臣并不担心今日师出无功，而是担心实力不继，有功而不可继，就更让人担忧。自古以来的君主都是先治理国内，后经略国外。现在陛下看一看，今日的内政已达到极致了吗？陛下亲政前，国内的弊端有多少？现在亲政后，又改了多少？国内尚且有令不行，又怎么能够威行国外？这是臣所担忧的第一点。自古以来的帝王要动用他的人民，一定要取得他们的拥护。可是几千年来，百姓不知有所谓效忠国家的大义，再加上州县官吏的盘剥、势家的兼并，民怨沸腾，恐怕会趁陛下用兵北方之机，在南方骚动，此臣担忧的第二点。历来君主图谋进取，定要选将练兵，丰财足食，然后才能进兵，眼前陛下将无独挡一面之将，兵多为新附之兵，无将无兵，怎能轻言出征？而且出兵千里之外，粮运难继，那时就会一筹莫展，这是臣所担忧的第三点。三点之外，臣不多言，请陛下早日定夺，平息众人之议。他们极力主张选将、练兵、储财、积粟，“自固吾圉”，待时机成熟后再图恢复。所有这些，宋理宗一概不听，悍然命令宋军采取行动。六月十二日，宋军发兵6万，正式进军河南。命庐州知州全子才率兵万人直取汴京，赵葵率兵五万取泗州，由泗州赴汴同全子才会师。起初，由于蒙军主力撤离河南和出于战术需要主动以“空城”诱敌，宋军一路势如破竹，六月底“收复”南京归德，七月五日“收复”了东京开封。并实现了两路宋军的会师。

进入汴京之后，求功心切的宋军主将赵葵，不察蒙军军情，不问军饷馈乏，一味督促宋军西进，七月二十日，宋军先头部队进驻洛阳，但后续部队却在龙门遭到蒙军伏击，损失惨重，并造



成宋军首尾分割，入洛部队在绝粮情况下无力再作抵抗，只得决定撤兵，不日，驻汴宋军也不得不退兵，至此，恢复“三京”的军事行动宣告失败。

“端平入洛”的失败，对宋理宗来说，犹如当头棒喝，同时也给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带来了更加深重的危机。宋理宗被迫垂下高贵的头颅，颁布《罪己诏》，向国人检讨自己的失策。他以沉痛的心情，承认“兵民之死战斗，户口之困流离，室庐靡存，胥鬻相望”的悲惨现实，全在于他本人“明不能烛，德有未孚，上无以格天心，下无以定民志”，由于本人“责治太速，知人不明”，而造成了“宅里墟于青烟，甲卒屠于白刃”。迫于现实，宋理宗对蒙政策，不得不作出截然相反的大转弯，由进攻转入防守，先前那种“规复故土”雄心壮志，如今早已烟消云散了。

二

理宗即位，史弥远还担任他的宰相，并且又一口气独掌朝政九年。宋理宗对这位铁腕人物既感激又害怕，上台伊始，就拜这位右丞相兼枢密院使为太师，并进封为魏国公，感恩戴德之情不言自明。

史弥远逼死济王赵竑，又劝理宗追夺他的王爵，降封为县公。名士魏了翁、真德秀纷纷上书为济王鸣冤。史弥远极为恼火，便唆使梁成大、李知孝、莫泽弹劾真、魏二人。梁、李、莫三人号称“三凶”，个个凶狠无比，尤以梁成大为最。连三凶之一的李知孝都说，世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与梁成大青史同传。宝庆元年（1225）夏天，杨太后撤帘归政后，国家大事移交理宗处理。三凶便连接上书，弹劾真德秀和魏了翁，说他们两人与济王有私，朋比为奸，危害国家。理宗虽清楚这一切都是史弥远背后主使，但却无力摆脱自己的傀儡地位，只得将两人罢官。史弥远任用三凶，凡意见与他相悖的大臣，纷纷遭到攻击去职，史弥远牢



牢地控制了朝廷大权。

绍定四年(1231)九月,首都临安发生大火,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冯榘,带领禁军专门防护史家相府,而对其他地方置之不理。结果,大火烧掉了太庙、三省、六部、御史台、秘书省,连存放皇帝家谱的玉牒所也陷入火海。丞相府却因救护有力而没有遭到损坏。大火过后,余烬未灭,理宗登高眺望,只见残垣断壁中,豪华的相府显得分外突出和刺目。不由得在心头泛起丝丝苦水。由于灾情严重,理宗身着素服,减少每餐所上的饭菜,撤去了就餐时设置的乐队。各官署无处办公,理宗只好下诏临时安置。结果,太庙的祖先牌位被暂时安放在景灵宫,三省、枢密院移到都亭驿,六部则搬到传法寺,尚书只好与和尚为伍。对于这一滑稽的景象,有人讽刺说:“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时史弥远被封为汾阳公)。九庙神灵飞上天,可怜九庙成焦土。”

一场大火,检验了理宗自己所处的尴尬地位和史弥远所具有的赫赫威势。宋理宗认为大火是上天降威,就下诏让臣民直言过失。校书郎蒋重珍上书说:“臣切望陛下亲揽大权,不要托付给他人。从前周勃亲手将御玺授给文帝,当晚就不再统领南北军队;霍光定策拥立皇帝,次年就交出了权力。现在陛下已即位八年,没听说过有什么作为,进用或斥退人才,政事兴废,天下人都知道是丞相的意图。哪有作为天子之尊,万民之主,自朝廷以至百姓,只知有丞相而不知有君主呢?上天要烧掉宗庙,焚毁都城,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九庙是国家重地,关系国家生存,竟不预先防火;相府是丞相私宅,偏偏防火于未然得以保存,可见人心堕落,只知有权势,不知有君父。倘发生变故,陛下依仗什么人呢?请陛下自视一下,难道不够孤单吗?孝宗朝史浩有功,两次入朝作相,时间都很短,这是为什么呢?保全功臣的办法,可以厚给富贵,但不能让他长期掌权啊!”蒋重珍的上书,字字句句都敲打着理宗那颗长期压抑的心,他大为感动,当即罢免



了冯榭,但对史弥远,则仍不敢公开表示不满,仅仅依其请求降爵一级,并让他继续执政。

1233年(绍定六年)十月,不可一世的史弥远终于命归西天,被这位权臣挟制了近10年的宋理宗终于长出了一口气,开始“亲总庶政”。史弥远死后不到半月,宋理宗就下诏宣布改明年为端平元年,以示改元更化。宋理宗亲自料理各种政务,“赫然独断”。他的老师、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君臣上下似乎要有一番作为了。

“三凶”之一的莫泽一看形势将变,就在理宗下诏改元的前一天,居然攻击也是三凶之一的梁成大,说他“暴狠贪婪,苟贱无耻”,竭力表明自己的清白。史弥远阵营的内讧,促使对史弥远不满的官吏,纷纷抨击那些依附史弥远、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的势利小人,莫泽攻击梁成大二十天后,就被理宗以“贪淫恃害”之罪罢免,李知孝、梁成大也在廷臣弹劾下一再遭贬。薛极、胡榘、聂子述、赵汝述四人,名字中各有一“木”,号称“四木”,都是史弥远的死党,也被逐出朝廷,史氏专权的局面结束了。

理宗亲政之初,慨然思有所作为,他“急欲洗濯三十年积弊”以实现“中兴宋室”的宏愿。他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诏求直言”,整顿朝政。一方面斥罢了史弥远扶植的“三凶”、“四木”等一批党羽、亲信,结束了史弥远长期专权的局面,另一方面,又召还了长期遭受史弥远排斥打击,在社会上有较高名望的一批忠贤之士,如号称“二贤”的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被委以要职。其次,又着手整顿吏治,先后实行奖廉惩贪、抑冗去滥等措施;在经济上,面对“帑藏空虚、民困于横敛”的破败景象,着手回收发行过滥的纸币,以提高信誉,同时强化食盐等项物资的专卖,并大力号召节制费用。试图通过这些举措改善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

宋理宗亲政后的这些振兴图治之举,被称为“端平更化”,时号“小元祐”,宋理宗本人也以师法“元祐”自居。并为此沾沾



自喜。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无情的现实却打破了宋理宗种种美妙的幻想。一则所谓的“端平更化”是在南宋王朝积弊甚深的背景之下进行的,有人称之为“自史弥远相于嘉定迄于绍定,凡二十有七年,天下之势如人垂老而得疾,故其药之也难为力”。宋朝国势此时已到了“无力回天”的地步。二则种种更化的措施大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而不治本,就是这些效果极为有限的措施也难以得到彻底的执行。因而所谓的“端平更化”变得有始无终。史弥远的亲信虽被清洗,但拔贤黜佞并未形成制度,董宋臣、丁大全、贾似道等一批祸国殃民之徒又先后延纳进朝廷并逐渐受到重用,而被召用的人才却大多用来装点门面。“更化”之初,真德秀应诏而起,可“立朝数月,所请之事无一施行”,相反却是“受命数月,朝令夕改,无所禀承”。整顿楮币,强化食盐专卖,其出发点在于“敛财”而不在于“生财”。诸如此类,南宋小朝廷并没有因宋理宗的“更化”而“中兴”,反倒因“端平入洛”的失败,使局势更进一步恶化。尽管在以后的岁月中仍不时声称要进一步推行“更化”,但整个国势仍无起色,而他本人则随着一次次“更化”的受挫,变得日益消沉。随着年龄增老和身体的衰弱,宋理宗越来越怠于政事,转而开始崇尚道学,虚谈经筵性命,沉缅于酒色文章,最终导致整个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一发不可收拾。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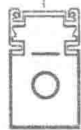
宋理宗还是继宋真宗、宋徽宗之后对佛道教(特别是道教)有着浓烈兴趣的皇帝,为了追求长生不老的虚狂境界,他寄希望于道教的斋醮方术和佛教的念经祈请之上。在位期间,不惜动用大量民力财力,先后修缮了佑圣观,重建了佑圣观观门,并在西湖旁边新建了西太乙宫,1244年(淳祐四年),又在自己做沂王时的府第大兴土木,建造道宫,并赐名为“龙翔宫”,由于工程



浩大，沂王府故地不够使用，又拆毁民舍三分之二，造成近千户、万余人无家可归。1250年（淳祐十年），理宗见绍兴中期修建的报恩光孝观破烂不堪，又不惜重金，下令临安府组织修复。同年，为了取悦于宠妃阎贵妃，理宗又下令在西湖积庆山九里松附近开工建造新的佛寺，一时间，临安附近州县“望青采伐，鞭笞追捕”，有人愤愤不平地赋诗称：“谁知广厦千斤斧，砍尽人间孝子心”。1252年新寺完工后，理宗赐名为“显慈集庆教寺”。杭人百姓意气难平，有人乘僧人不备，大书联句于法堂大鼓之上，称“净慈灵隐三天竺，不及阎妃之媚君”。阎妃之外，理宗还曾为另一位宠信的贾贵妃修建了演福寺，并赐以大量官田作为寺产。

宋理宗大兴土木的昏庸行动招致了朝野上下的反对，太学生刘黻尖锐地指出，“十数年间，创龙翔，创集庆，创西太乙，而示之以优幸，导之以祷祠，惑之以虚诞不经之说，”严重损害了宋理宗的形象，太常博士牟子才则忧虑地指责宋理宗“今日醮内庭，明日祷新宫，今日封神祠，明日迎佛像，倚靠于衲子，听命于黄冠”，已经离宣和之败亡相差无几了。

面对这些恺切之言，宋理宗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杭州洞霄宫道长孙处道，奏请朝廷解决道宫经济困难，宋理宗当即应允，特赐内府所藏道士度牒，用以换取田地。孙处道以此作资本，买田置产，数月之内，即创建“常丰庄”。宝祐年间，宋理宗又下令将获川、长兴二县公田拨给孙处道，以扩充洞霄宫田产。并亲赐“洞天福地”以示赞赏。宋理宗对道教的崇信，还表现在他对女冠吴知古的宠信上。吴的出身及经历史缺记载，但此人凭着非凡的手腕得以进入宫禁。从端平到宝祐的20年间深得理宗宠信。是宋理宗在位40年中最为显赫的一位道士。吴扰乱宫禁，干预朝政，无所不为，不断有人上书弹劾。1236年（端平三年）宋理宗在明堂举行祭祀，忽然雷雨大作，右正言李韶借机弹劾吴知古，宋理宗不仅不为之警醒，反倒迁怒于宰相郑清之和乔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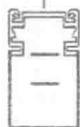




简,以招致天怒为由罢免两人职务,并另召崔与之相,崔拒不赴任,无奈之下只得将乔行简复相。1255年(宝祐三年)六月,宋理宗出于对吴知古的宠信,又将其两个侄子吴子明和吴子聪提升为知阁门和安吉守,一时舆论大哗,言官纷纷交章弹劾,称吴子聪等“依凭城社,势炎熏灼,以官爵为市,缙绅之无耻者辐凑其门,公论素所切齿”。宋理宗崇尚佛道所带来的政治恶果于此可见一斑。

四

同宋理宗日渐消沉、昏庸贪欲相伴随着,是南宋中晚期的政局越来越混乱。宋理宗即位之初,史弥远大权独揽,“独专国秉”,“古今所无”,将“权相政治”推向了顶峰,特别是史弥远自恃拥戴之功,根本不把理宗放在眼里,其权威恰如魏了翁所言,“五六年间威势已成,遂至决事开房闼,操权于床第”。“上无人主,旁无同列,下无百官”。1233年,(绍定六年),操纵权柄长达26年的史弥远终于寿终正寝,自此理宗开始亲政,他以“中兴”自诩,意欲有所作为,同时任命他的老师郑清之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以辅佐他成就一番大业。起初,郑清之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一时“声誉翕然”。至1236年(端平三年)九月,因明堂雷雨而被免职。从1239年(嘉熙三年)开始,宋理宗相继任命乔行简为平章军国重事,李宗勉为左丞相,史嵩之为右丞相。三位宰相中乔行简年届八十,遇事模棱两可,不涉及好恶是非,人称“伴食宰相”。李宗勉虽然能够秉公处事,但也处处小心谨慎,右丞相史嵩之为史弥远之侄,曾任京湖制置使,因反对出师河南而辞官故里,1238年(嘉熙二年)被召为参知政事,次年出任右相。任相之初,对于挽救“端平入洛”带来的危局,起用贤能和整顿财赋曾有过贡献。但史嵩之同其叔父一样喜欢专权。受史弥远的影响,他迎奉皇帝极有手腕,渐渐取得了理宗的信任,乔





行简告老，李宗勉去世后，史嵩之便独揽大权。一些正直的大臣如杜范、游侣、刘应起等人都因对他的种种作法不满而遭到罢免。

史嵩之独揽大权之后，始终有一块心病挥之不去。他的双亲已经年老，他担心双亲突然病故，自己就会因守丧而丢掉职位，因而便预为起复之计。他借口需要，将服丧未毕的马光祖起用为淮东总领，又将守丧不满的许堪起用为镇江守将。对于史嵩之的用心，民间曾有人作诗讽刺说：“光祖作总领，许堪为节制，丞相要起复，援例。”

史嵩之的良苦用心终于收到了预期效果。1245年（淳□四年）九月，史嵩之因奔父丧，不得不去职，但丧服未除，即被宋理宗起复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朝廷官员无人敢提出异议。太学生黄恺伯等144人诣阙上书，指斥史嵩之“心术不正，行踪诡秘”，称史从前做都督时，力主和议，瓦解将士斗志，以后窃据宰相之位，网罗天下小人作为自己党羽，攘夺天下之利归于私家，处心积虑，居心叵测。史嵩之在朝廷一日朝廷就受害一日，在朝廷一年就会受害一年。眼下史之父病死，使他不能不卸任归家，朝廷内外都大快人心，可陛下却又发出了重新起用他的诏令。堂堂中国，岂无君子，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恐怕大宋三百年江山将会葬送于史嵩之之手。他们强烈要求宋理宗收回成命。

宋理宗接到太学生们的上书，没有立即批示。结果，武学生翁日善等67人、京学生刘时举等94人又反复上书，宋理宗坐不住了，他恼怒地说：“学生所言，虽是正论，但未免过甚。”将作监徐元杰反复劝谏，理宗才平息怒气。以太学生为代表的社会舆论中心给史嵩之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他被迫上疏请求回家守丧。理宗这才下旨，同意史嵩之的请求，另外起用范钟、杜范为左右丞相兼枢密使。

杜范入相后，即劝谏宋理宗实行五事：“第一正国本，第二



整顿后宫,第三选拔人才,第四不轻易赏官,第五节约财力。”理宗表示认可。杜范于是详细规划,逐步实施。但杜范为相,仅仅80天就患重病去世,一个月后,杜范的得力助手徐元杰、刘汉弼相继暴亡,一时间朝野哗然。大家纷纷又把猜疑的目光对准史嵩之。

1247年(淳□六年),左丞相范钟因涉嫌谋杀杜范等人而被迫辞职。右丞相游侣也多次上书乞归田里。朝中不可一日无宰相,无奈之下,理宗准备重新起用史嵩之。殿中侍御史章琰、右正言李昂英、监察御史黄师雍一起上书,弹劾史嵩之无君无父,罪恶滔天,虽死难赎。理宗听不进去,一怒之下,将三人罢免。翰林学士李韶抗疏力谏,理宗才改变主意,命史嵩之致仕,以示不复进用。

理宗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只好将故相郑清之任命为右丞相。郑清之此时已全然没有端平之初的雄心壮志,他放浪湖山,自号“安晚”,无意于政治。勉强出山之后,也是年老眼花,力不从心,政事多交其侄孙郑平原代理。其家人则乘机大肆纳贿,引起非议。有人甚至登门指责他为“端平败相,如今又重来祸害天下”。

1251年(淳□十一年)郑清之去世,理宗复又想起用史嵩之,迫于众议,最终只得作罢,最后任命谢方叔和吴潜为左右宰相。如果说,此时的宋理宗有时还能听进一些意见的话,到宝祐时期(1253~1258),宋理宗50岁以后,在南宋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权相政治怪圈的阴影又一次笼罩了整个朝廷。

1251年(淳□十一年),理学名人董槐被宋理宗起用为签书枢密院事,成为执政大臣,1253年又拜为参知政事,1255年接替谢方叔更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主持朝政。董槐试图以理学“格君心之非”,毫无顾忌地指出戚里不奉公守法、执法官员专擅权力和皇城司对属下士卒管教不严是败坏朝政的三大因素,招致众人的嫉恨。时深得理宗信任的侍御史丁大全企图攀结董